



宏阔视域的建构 新人耳目的考论

——读《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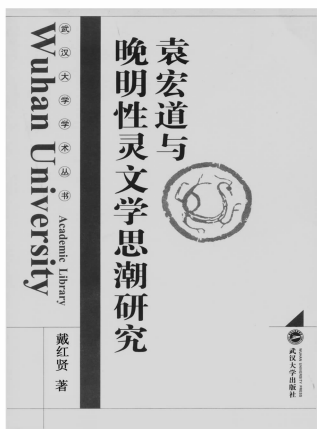
朱晓青

袁宏道在尘封三百余年之后的20世纪前期重见天日,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但周氏对公安派文学之近代化价值的判断主要建立在明代性灵派与复古派的二元对立认识基础之上。周质平《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1986年)批评了以“载道”与“言志”划分七子与三袁的做法,并质疑林语堂、刘大杰等人过誉袁宏道的行为。那么,性灵派与复古派关系如何?性灵说与王学关系怎样?性灵派文学的近代化价值何在?若想就这些问题得到较为公允信实的观点,必须对前人的惯性思维有所突破,必须有更为宽阔的学术视野,还必须对以袁宏道为中心的性灵派文学的微观景象予以切实考量,如此才能避免“矮

子观场”,才能“独抒己见”。戴红贤博士《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有意以前贤时修构筑的学术平台为起点,独立思考、取精用宏,以形成自有系统的学术观念。该书首次系统而全面地考察了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之间广泛而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将个案研究与断代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探寻以袁宏道为代表的众多性灵作家的精神历程,阐释晚明性灵文学思潮的来龙去脉,在宏观的理论建构和微观的文学个案研究两方面皆有所成就,有所创新。

较之传统的公安派研究而言,将袁宏道置放于晚明文学的背景之下,对袁宏道与晚明性灵文学思潮展开研讨,点面结合、考论结合,不仅有利于对袁宏道人性思想、文学思想及其诗文创作的重点研讨,对晚明时期文人创作群体中其他成员如袁宗道、陶望龄、江盈科、袁中道以及竟陵派等的创作主张与实践的普遍梳理,而且还有利于对晚明文人创作理论与实践的学理探讨,对作家关系诸如袁中道与钟惺断交等史料的勾稽与推绎,以展现晚明时期性灵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的局面,使该研究具有较为富足的研究空间,既新义纷呈,又显得十分大气。至于借助西方人文科学观念、文学理论要义作切合实际的比较分析,阐释袁宏道性灵说以性灵人学为“体”、以性灵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为“用”的三位一体的特征,指出袁宏道性灵人学思想主要解决什么是作者真我真性和作者如何获得真我真性的问题,其性灵文学思想旨在确立诗文自由表达作者真我真性的创作原则,其性灵诗文则不拘格套地抒发了袁宏道的真实个性,认为此三者由内及外,互相关联,袁宏道的人学思想、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被主张解脱束缚而使真我真性显现的基本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一个富有生机的整体。其所用方法和所得结论都使人有新异之感。

“性灵”范畴的阐释是颇有挑战性的问题。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1928年)、



顾远芾《随园诗说的研究》(1936年)、郭绍虞《性灵说》(1938年)等中外学术前辈皆有所探求。对“性灵”予以多视角的立体关照以索解其丰富内涵是该书的追求:从古代人性学史的角度考察“性情”“性理”“性灵”的关系,指出三者都是探究人性问题的范畴,互相有联系,但彼此关注焦点有差异。性灵一词的关注焦点是“灵”,这既与性情一词中的性情并列关系不同,也与性理一词中的以“理”为关注焦点不同。真识、真情和真趣遂成为性灵真性的主要内涵,从而揭示出晚明性灵文学不以“第一”而以“唯一”论古今诗人的新人文精神与王学张扬主体精神的个性学说的密切关系。至于历时性地考察性灵文学在南朝、南宋和晚明三个时期的具象,则是为了探索性灵内涵递进式的发展图景。南朝张融自我意识强烈,主张文体新变与独创,高度肯定作者自我孤神独逸的超越精神,使性灵文学思想与传统性情文学思想拉开了距离;南宋张鎡等性灵诗人,则在生活情调的艺术化、人生精神的闲适化、诗文表达的自我化、艺术形式的自由化等方面为性灵文学思想加添了新色彩,并对袁宏道等晚明诗人及其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李贽、徐渭、焦竑、汤显祖、屠隆、袁宏道等文艺大家共同开创了性灵文学的新局面,晚明是古代性灵文学的高峰期。对“性灵”这种多维立体观照展现了性灵学说的深厚传统文学思想背景,深化了对袁宏道“性灵说”的认识。

对微观问题的探究,亦饶多新人耳目之论。首先,对某些流行论断进行剖析并提出己见是戴著的一个特色。如袁宏道诗歌创作的前后分期问题,作者通过具体而微的细腻论述,指出万历二十六年至万历三十四年是袁宏道诗歌艺术的成熟时期,也是袁宏道诗歌创作成就最大的时期。如袁宗道文学思想的转变问题,该书指出万历十七年前后,通常意义上的公安派文学还并不存在。万历二十四年左右,袁宗道的文学思想明显发生了由重实用、重道德转向重个性表现、重性灵抒发、重不拘格套的变化。又如袁中道与钟惺绝交的时间和原因,作者通过校勘不同版本《珂雪斋集》指出,二者断交并不是因为万历三十八年涉及钱谦益与韩敬的庚戌科考案件所致,而是因为袁中道和钟惺对待袁宏道诗学传统的态度差异,《诗归》的出版直接导致了袁中道与钟惺的断交,断交时间在万历四十五年《诗归》刊行到万历四十六年《珂雪斋前集》刊刻之间。其次,对性灵学说的一些理论问题探讨予以拓展则是另一特色。如袁宏道表现真我的文学观与个性学说的具体关系怎样?作者借用个性和自我等现代理论,指出个性的觉醒产生了自我和他者的分离意识,“独抒性灵”的表达冲动是个性面对他者或社会大众的一种反应。王学以及丰富的传统文化涵养了袁宏道等晚明士人的独特个性,晚明士人个性的张扬是在面对观众时的自我表现。这种表现有时近乎表演,袁宏道的山水游记和尺牍的表演性就很明显。又如袁宏道“性灵说”与钟惺“真诗精神”的关系是自然个性说和艺术个性说的区别:前者侧重以良知说为基础的自然个性,后者偏向“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和“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的艺术个性。最后,对学术界或语焉不详,或未涉及的问题予以实证研究也是戴著的特色之一。如,袁宏道所叙袁中道早期诗歌究竟包括哪些作品,袁宏道山水游记小品异文问题及其艺术精神和手法与唐宋山水画、文人画之关系问题等等。

总之,丰富多姿且新义纷呈的论说使戴著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这些见解对于传统之论,或有所纠正、有所补充、有所完善,其说有的结论无可置疑,有的自成一家之言,都是对该领域学术研究的贡献。不过,所谓“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以袁宏道为中心辐射晚明文学而可能导致的研究盲区使得该书的历史背景展现稍嫌单薄,公安派、竟陵派等性灵作家的创作艺术探究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等等。然而,正如熊礼汇先生所言,“戴红贤朴实好学,做学问有一股韧劲,凭着她的勤奋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学术上超越自我是指日可待的。”

● 作者简介:朱晓青,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湖北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何坤翁